

理想主义者的剪影

——青年胡风

胡风，原名张光人，又名张光莹，号谷非，1902 年生于湖北蕲春，1925 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曾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就读，后来到日本留学。1933 年春间，日本取缔共产党，胡风牵连在内，被日本警视厅监禁数月后遣送回国，在上海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正式开始他的文学事业，在这之前，他曾以谷非、谷音、张古音、鼓声等笔名写过文章^①。胡风从日本回国后，二十年中间，他与中国共产党的文艺路线虽有过争执，但基本上一直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家，“在政治上他是站在进步方面”，“一直坚持反帝、反封建、反国民党的立场”，对国民党统治下的“反动的法西斯文化作过斗争”，有过贡献^②。这情形到解放后却

① 关于胡风生平资料可参考：（a）文艺报编辑部辑录：《关于胡风反革命活动的一些事实》，《文艺报》第 12 号（1955），页 1～2。（b）鲁喟然：《胡风事件的前因后果》，页 1～2，香港，南风出版社，1956。（c）杨燕南：《中共对胡风的斗争》，页 78～82，香港，自由出版社，1956。（d）赵聪：《胡风爆炸的火花》，见《大陆文坛风景画》，页 79～82，香港，友联出版社，1958。（e）王章陵：《中共的文艺整风》，页 99～100，台北，国际关系研究所，1967。（f）何家槐：《一贯反革命的胡风》，见《一切爱国青年起来投入肃清暗藏敌人的战斗》，页 10～24，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

② 林默涵：《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云：“胡风曾经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文艺活动，在政治上他是站在进步方面，对国民党反动的法西斯文化作过斗争。在这方面，胡风有他的贡献。他的文艺思想，也不是全部错误的，在某些个别的问题上，也含有正确的成分。”《文艺报》第 2 期（1953），页 3。

演变成一个戏剧性的终结：1955年7月，经过将近三年的波谲云诡的批判和反抗，胡风终于以“反党、反人民、反革命”的罪名被捕下狱，同时被卷入这事件的文艺工作者约三十人，成为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大的一次文艺整风活动^①。这次发动了整个国家的文化机构，而且由毛泽东亲自领导和加上按语的运动，就像延安时期以来的历次整风一样，其间的矛盾和发展，自然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和文艺政策，甚至于牵涉到文坛的宗派恩怨，这些原因已有不少著述论及，可以不必重述^②。这里只想就胡风早年的思想倾向，探讨这事件的发生契机，这除了对整个问题可以有较直接的透视

续② 何其芳：《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云：“胡风同志是很早就参加革命文艺活动的文艺工作者。他一直坚持反帝反封建反国民党的立场，这是首先应当肯定的。他的文艺思想也曾接受过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的影响。然而，在文艺的某些根本问题上，他却一直保持着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观点”。又说：这“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前的革命文艺界，本来是相当普遍的现象。胡风同志的错误的严重性在于他在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并不用它来检查和改造自己的思想，仍然积极地宣传他那些错误观点，用它们来和革命文艺的新方向对抗。这样，他和他的支持者实际上就成为一个革命文艺界内部的反对派了”。《文艺报》第3期（1953），页12。这两篇文章是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先锋，它们的观点有一定的代表性。

① 1955年5月25日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联合扩大会议决议，通过开除胡风的中国作家协会会籍及撤销其所担任的职务，并向最高人民检察院建议对胡风的反革命罪行进行必要的处理。《文艺报》第11期（1955），页29。1955年7月1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秘书长彭真宣布胡风被捕，见鲁喟然：《胡风事件的前因后果》，页27，香港，南风出版社，1956。有关胡风集团作家，见杨燕南：《中共对胡风的斗争》，《“胡风集团”的阵容》章，页77~125，香港，自由出版社，1956。

② 毛泽东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所下的按语，登于《人民日报》1955年6月10日。同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等四学部成立大会，通过建议政府依法惩办胡风反革命集团罪行的决议。见《新华月报国内外大事记》1955-1960，V.2，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 Association of Research Libraries, Wash.D.C., 1972。研究胡风被整肃的著述，除注①b—e外，可参考：Merle Goldman: Hu Feng's Conflict with the Communist Literary Authorities, China Quarterly, no.12(1962), pp.102~137. D.W. Fokkema: Literary Doctrine in China and Soviet Influence, 1956-1960, pp. 21~26, Mouton, the Hague, 1965.C.T.Hsia: 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2nd ed., Yale Univ.Press, 1971, pp.304~308, 326~336.

外,对于下面要讨论的胡风的文艺观点和批评,也可以提供基础上的了解。

一

关于胡风的出身,据他 1941 年为一个外国杂志的征文附带写的一篇自传说,他出生在一个早已破落的世家,父母亲靠做豆腐维生,父亲性情刚直,治家非常严厉,而他的贫农出身的母亲,则是个慈善而多感的女人。他的大哥是个能干的做面的手艺人,二哥是个勤劳的佃农,因为这两个兄长的努力,他们家才“稍稍宽裕”了起来,不过在生活上仍是“受着绅士们底威胁”。由于劳动力不足,幼年的胡风曾做过牧牛、看守稻子一类的事,直到十一二岁才被送进村学就读^①。根据这自传,胡风的阶级成分是不错的,可是在 1955 年整肃胡风运动全面展开时,《湖北日报》登出一篇文章,对胡风的家庭背景却有完全不同的说法。据该文报导,胡风一家远非“稍稍宽裕”所可形容,相反的,他的大哥是个罪大恶极的恶霸地主,靠窑业、作坊、高利贷剥削当地乡民,因此被称做“五毒”、“恒丰堤内一霸”。至于他二哥,则是个不劳动、雇长工,被当地人称之为“细心细肝,面善心恶”的狡猾地主^②。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故事,一边可能经过爱与回忆的修饰,另一边可能为达到政治目的而有所膨胀,很难用为进一步探讨胡风早年生活和思想发展的根据。这里只有从他的时代和他早期的创作,寻找他由一个闭塞的村童如何走入文艺天地的一些消息。

像“五四”以后的许多作家一样,胡风在青年期是以诗人的姿态出现的。1937 年他以《野花与箭》为集名,辑了一些他早期的作品,在《题记》中,他希望读者把那些诗看做“曾经消耗了作者底少年生命的所爱和所憎底片影”。此外,他录下了当年他写在那些诗的抄本前的题词,其中有一条说:

我底少年生涯是销磨在颓垣恶草中,这儿所留的是在那无路的颠仆里寻路的痕迹。虽然是毫不美观的伤痕啊,但它

① 《民族战争与文艺性格》,页 191~192,上海,希望社,1946。此书解放后改名为《剑·文艺·人民》,1950 年由上海泥土社出版。

② 《文艺报》第 12 期(1955)转载,页 17~19。

们却隐隐记着我“过去的悲哀”了。

在另一个抄本前，少年的胡风先引了法国作家莫泊桑的一段话，“我们生活中的精神痛苦，完全由我们永远是孤单的而来，我们一切的能力，我们一切的动作，简直只向着驱除寂寞的趋势走”。接着，他加上自己的表白：

至于我，我徒然将我全个儿奉让的心愿，徒然将我灵魂的一切门户洞开。然而我简直不能达到将我安置的地点。^①

这些题词加上那时而灰暗、时而激愤的诗篇，我们看到了一个大约可以称作“五四”精神特征之一的少年漂泊者世界，这是胡风在我们面前出现的第一个面影：寂寞、彷徨、不彻底的反抗和过多的叹息。1934年，他为《文学》杂志周年增刊写的《理想主义者时代底回忆》一文，曾大略叙述他早年的文学活动和思想变化的情形，文中他把自己从日本回国以前的阶段形容作“先天不足的理想主义者”，据他解释说，那是因传统的乱世文人逃避现实的“遗世”思想，加上“五四”运动后的思潮所给他的“没有注释的光明”而形成的一种心态^②。这个阶段，是胡风的文学事业和思想的奠基时期，在时间上，它与被称作中国新文学运动的第一个“伟大的十年”（1918—1927），大致上相合。就像新文学运动在这十年间经过许多复杂的变化，胡风个人的思想和生活在这期间的发展也是曲折的。下面我们来逐步探讨它的经过情形。

在村学里读了几年艰深的古文之后，大约在“五四”运动那年，胡风考入县城里一个新式的公立小学。一年后，因得不到满足，他反抗了家里的意见，跑到武昌去进中学，这时是1921年，胡风十九岁。对于这段不安定的求学生活，他后来解释说：

当时对于一般以“法政专门”为唯一志愿的地主少爷们有了强烈的反感，在专门教《左传》《古文辞类纂》的小学里面又住不下去，只是隐约地想着一定有更明亮的地方，因而跑了出来罢了。^③

这时“五四”运动已过去了两年，但是到了武昌后，在他就读的那个

① 《野花与箭》，页 i-ii，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6。

② 《文艺笔谈》，页 399，上海，文学出版社，1937。

③ 《文艺笔谈》，页 400，上海，文学出版社，1937。

中学里，胡风发现他所向往的光明，只不过是选本古文之外再加上一些繁重的课目，还有就是些成天在外面结交小政客的前辈以及热衷于学说英语的同学，他们当然不能成为胡风的同类。幸而这时新文艺作品大量出现了，他“狂热地像发现了奇迹似地接受了它们”^①，让“各种不同的甚至互相矛盾的东西”在他“单纯的脑子里跳舞”^②。这时，胡风结交了一个叫 S 君的同学，他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他们读胡适的《尝试集》，郭沫若的《女神之再生》，读共产党机关刊物《向导》，也读自由派的《努力周报》，思想上可以说是兼容并包。他在这段时间的生活，据他后来回忆说，那时因“五四”运动退潮期的低回忧郁的情调在文艺里强烈地出现，加上他母亲的亡故留给他的深沉的悲哀，使他“陷进了近于悲观的忧郁心情”^③。由于这缘故，这时他觉得使他“真正接近了文学也接近了人生”的两部作品是：冯雪峰、汪静之等人合著的《湖畔》诗集，以及王统照的小说《一叶》。他认为：

前者教给了我被“五四”运动唤醒了“自我”的年青人底感觉，救出了我被周围的生活围困住了的心情；后者所吐出的幻灭后的叹息，恰恰提醒了我在生活里面追求着什么的意识，使我很久地感到无名的怅惘。^④

“人”的发现和“自我”的意识，这是胡风后来在评价“五四”文化运动时屡屡提到的，这一点我们后面会讨论到。在这里应该注意的是，年轻的胡风在踏入新文学的园地时，吸引他的并不是充斥当时文坛的恋爱小说，不是以“礼拜六派”为代表的鸳鸯蝴蝶故事^⑤，而是偏向较严肃的、当时的新青年的呼吸的一面。在他上面提到的作家中，郭沫若这时正沉醉在“生底颤动，灵底喊叫”的巅峰，在缪斯的感召下，狂热地挹取那“命泉中流出来的 strain，心琴

① 《民族战争与文艺性格》，页 192，上海，希望社，1946。

② 《文艺笔谈》，页 401，上海，文学出版社，1937。

③ 《民族战争与文艺性格》，页 192，上海，希望社，1946。

④ 《文艺笔谈》，页 401，上海，文学出版社，1937。

⑤ 茅盾曾以笔名郎损在《小说月报》12卷8号发表《评四五六月的创作》一文，统计1921年这3个月中120余篇小说的题材，结果是：“描写男女恋爱的小说占了全数百分之九十八”，可见当年恋爱小说盛行之一斑。见《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三册《小说一集，导言》，页9引，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6。

上弹出来的 melody”，来创造那“人类底欢乐底源泉，陶醉的美酿，慰安的天国”的诗篇^①。胡风这时读的《女神之再生》就是藉女娲补天的神话，歌颂创造一个新的太阳的诗剧。另一边，冯雪峰、应修人、汪静之、潘漠华这四位“湖畔”诗人，则是生活在诗里的梦幻的年轻人，他们以抒情的调子，在爱与大自然中尽情歌唱自我和生命的悲欢。比起上面两个世界，王统照的《一叶》是比较灰色阴郁的，这位属于“文学研究会”的诗人和小说家，一直在爱与美的憧憬中，以他不灭的热情探索有理想有幻灭的现实和人生。从上面胡风走近文学的方向来看，他所要求的是属于新时代的气息是很明显的，而在选择上他大致是倾向于理想和梦幻的一面，而不是热烈喧嚣的青春世界，虽然他承认自己曾“贪馋地”读过郭沫若。由这个倾向发展下去，他很自然地走入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Vasely Eroshenko）和冰心女士的世界。也就在这个时候，他开始写起冰心的《春水》式的小诗，据说不到一年他就写满了厚厚的两个抄本^②。

爱罗先珂和冰心是二十年代初期常出现在北京《晨报副镌》的作者，在当时年轻的知识界具有广泛的影响，尤其爱罗先珂的世界主义和乌托邦信念，更被当作福音似地传播着^③。胡风在武昌读《晨报副镌》时（1921—1923），正是孙伏园主编的时期，除了爱罗先珂的童话和诗，还不断刊登他对旧俄文学、思潮和社会问题的演讲，以及关于他本人的思想和生活的介绍^④。从爱罗先珂方面，胡风觉得感动的并不是他为一般人称道的近于童话和梦境的诗的世界，而是这盲诗人所预言的人类的“光明的国土”，其中最有力地打动他的是那些作品中“在黑暗重压下的人物向往那光明的国土的

① 田寿昌、宗白华、郭沫若合著：《三叶集》，页6，上海，亚东图书馆，1929。

② 《民族战争与文艺性格》，页192，上海，希望社，1946。《文艺笔谈》，页401，上海，文学出版社，1937。

③ 请参考周作人：《爱罗先珂君》一文，《泽泻集》，页77～95，香港，汇文阁书店，1972影印。这篇文章可代表当时中国知识界对爱罗先珂的了解和态度。

④ 从1922年3月到1923年4月，爱罗先珂多次在北京演讲，讲稿翻译皆发表于《晨报副刊》，详目见《晨报副刊分类目录》，《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一集，页505，521，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这些讲稿后来以书名《过去的幽灵》出版。

心”。从冰心方面，胡风特别珍惜的是她的“爱的哲学”，这使他生活里残存的封建感情被灌溉得开起了花，并使他“激动在大多数文学青年所经验到的如茁的情绪里面”^①。不论是爱罗先珂的理想的爱那其社会，或者冰心的概念化了的人生与爱的说教，胡风之接受它们，可以说是被时代的痛苦击中，因而急于追求明亮和解决的心理的表现。茅盾在检讨新文学的第一个十年的小说创作时曾说，从1922到1925年的五卅运动为止，“苦闷彷徨的空气支配了整个文坛”，那时的作者对人生问题的态度，已经由“五四”初期的热烈追求的气氛，一方面转化成“向一定的‘药方’在潜行深入”，另一方面则是“苦闷彷徨与要求刺激成了循环”。前者发展为“冷观的虚弱的写实主义的倾向”，后者的颓废面目则“狂热地风靡了大多数的青年”，然而不论外形上有冷观苦笑和享乐麻醉的分别，在根本上其为苦闷彷徨则一^②。冰心的作品，大概可以茅盾所说的“药方”来形容，它之膜拜母爱、儿童，讴歌大海和自然，事实上是不敢正视人生，而以想象取代现实的思维上的神秘化的游戏^③。由于这缘故，胡风虽热心地写《春水》式的小诗，企图把现实生活的挫折和刚失去母亲的悲哀，化解于泰戈尔似的东方神秘和对大自然的礼赞，但问题并不能因之解决。对于这矛盾的心理，他有一段很好的自白，他说：

冰心女士底皈依是从她底对于现实生活的感激而来的，而我底则恰恰相反：被像爱罗先珂底作品里面那样的沉重的空气压迫得呼吸都不能自如了，因而逼上梁山地幻想着孑然地站在绝顶上向遥空虚抱。所以并不能忘记身边的现实。^④他这时期写的诗，我们无缘读到，不过从他诗集中最早的两首

① 《文艺笔谈》，页401，上海，文学出版社，1937。

② 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三册《小说一集，导言》，页12，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6。

③ 草川未雨：《繁星和春水》一文评冰心这两本诗集云：“其表现是犹疑恍惚的，是模糊的，对于人生，社会及自然未曾敢肯定过一下儿，只是站在一旁说话，因为不敢肯定，所以说出来的话多是离开现世的玄想，因之走到恍惚的路上”。又说冰心“不敢正视人生，只想去创造神奇”。见李希同编：《冰心论》，页78~79，86，上海，北新书局，1932。

④ 《文艺笔谈》，页402，上海，文学出版社，1937。

诗《儿时的湖山》和《赠 S》(1925),仍然可以看出他这段自白里所表现的,那因青年期的夸张和过早的被现实击败,以至于梦幻地转向遥空虚抱着理想和解救的影子。可以想见,他在那自我的独立王国里应该流连过不短的一段日子。不过随着阅读的增广和现实经历,胡风的社会意识逐渐抬头了,在这中间,促使他从孤独的绝顶走入人群的是 1923 年吴佩孚屠杀京汉铁路工人的“二七惨案”。那时胡风二十一岁。

比起上海和北京,胡风当时就读的武昌,在文化活动上是逊色的。“五四”运动后,当新文艺刊物和文学团体像雨后春笋似地出现全国各地,湖北省却相当岑寂,以武昌而论,它发行过的少数几个刊物,像“星野社”的《星野》(《江声日报》副刊)、“鞞声文艺社”的小型月刊《鞞声》,武昌大学“艺林社”编的《艺林旬刊》,都在 1924 到 1925 年才出现^①,那时胡风已远离了武昌。可是作为辛亥革命的策源地,它的光辉传统却被具体地保存在工人运动的新形式里,这活动被当地的早期共产党员恽代英、黄负生、林育南、李伯钊等人秘密组织和支持着。早在 1919 年,恽代英就在武昌成立利群织布厂,团结工农青年。在学生运动方面,恽代英等也于同年先后组织了“互助社”和“共存社”,并以工读互助的方式办了“利群书社”,代售进步刊物^②,此外又发行《互助》、《我们的话》及主持《武汉星期评论》,向知识青年传播社会主义思想^③。1921 年夏天,湖北黄冈举行各地进步青年组织联合代表大会,毛泽东当时在长沙主持的“文化书社”和恽代英办的“利群书社”,都曾派代表参加^④。1920 年左右恽代英等又以学生为对象,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配合

① 关于“五四”以后全国文艺刊物、文艺团体概况,请参考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三册《小说一集,导言》,页 5~8,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6。湖北这几个刊物的创刊日期各为:《星野》1924 年 9 月,《鞞声》1925 年 4 月,《艺林旬刊》1925 年 1 月。

② 栖梧老人:《“二七”回忆录》,页 8~9,北京,工人出版社,1957。沈葆英(恽代英妻):《同代英生活在一起的日子》,文末附恽代英小传,见陈琮英、李星华等著,《烈士亲属的回忆》,页 38,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

③ 《五四时期武汉进步刊物·团体》,《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二集,页 484~485,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④ 沈葆英(恽代英妻):《同代英生活在一起的日子》,文末附恽代英小传,见陈琮英、李星华等著《烈士亲属的回忆》,页 38,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

《武汉星期评论》，宣传有关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支持学生和工人运动，讨论当时青年们关心的妇女解放、恋爱与婚姻自由等问题。直到1923年《武汉星期评论》停刊为止，恽代英、陈潭秋、董必武、萧楚女等时常在上面发表文章，颇为社会注意^①。这刊物对胡风影响很大，他自己承认因它对于社会现状的揭发，使他“有了当时青年人所有的愤激”^②。以胡风的年龄和他的不安于现实的倾向来看，他在武昌时除了读《武汉星期评论》和其他进步刊物，很可能还介入学生和工人运动，参加秘密组织。就在这种环境下，京汉铁路工人为争取组织工会的自由而引起的大罢工爆发了，吴佩孚手下的湖北督军萧耀南和京汉铁路管理局长赵继贤等，在武汉工人罢工后的第五天，也就是1923年2月7日，以血腥的屠杀结束这次罢工。这就是有名的“二七惨案”，是中国工人第一次有组织地从经济斗争转到政治斗争的运动^③。在这次运动后，胡风写了一篇小说《两个分工会的代表》呈献给牺牲者，它发表在当时被称为四大副刊之一的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这是胡风第一次发表作品，发表时用的是本名张光人^④。

“二七惨案”过去了，胡风也离开了那在他眼里“只是一片灰白了的武昌”，这是他第二次违反家里的意思，这次他到被当时南方的青年视为学艺圣地的南京，他在那里呆了两年多（1923—1925）^⑤。就像他在武昌的生活结束于“二七惨案”的怒火中一样，他在南京求学的日子结束于影响更深远的上海“五卅惨案”。他的生命是与苦难的中国现代史一道成长的。

二

1923年2、3月间，胡风到了南京。以一个二十一岁的文学青

① 《“二七”回忆录》，页29～30。《五四时期武汉进步刊物·团体》，《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二集，页485，487，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② 《文艺笔谈》，页402，上海，文学出版社，1937。

③ 胡华编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页34，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

④ 《文艺笔谈》，页402，上海，文学出版社，1937。文章标题见《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一集，页677，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⑤ 《民族战争与文艺性格》，页191～193，上海，希望社，1946。《文艺笔谈》，页402，上海，文学出版社，1937。

年,带着《春水》似的诗情,爱罗先珂启示他的光明国土,还有记忆犹新的“二七惨案”,这只五四的漂鸟投赴当时“以它的新精神在全国驰名”的南京东南大学附中,开始他生命中新的一页^①。

当胡风第一次违背家里要他成为一个清闲的读书人的愿望,从蕲春县城跑到武昌,这可能只是单纯的青少年期反抗心理的表现,在意识上,他除了成长期的朦胧的不安和不快乐外,未必有个一定的思想或方向。因此他虽不满于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社会上以法政专门代替科举出身的庸俗的市民观念,反抗子曰诗云之后的那个窒碍难通的、甚至于可笑的封建世界,对于自己的生命和社会的观念,他这时可能是相当模糊的。这情形正如他自己所说,只是一种被“生活围困住了的心情”,一种“在生活里面追求着什么的意识”,除此之外,他大概再也没有更清晰更具体的抱负存在。可能由于这缘故,他到了武昌后再度对现实失望时,才会狂热地投入书刊中,在“五四”运动给他的“没有诠释的光明里”,扮演苍白的理想主义者的角色,在诗和小说里“接近了人生”,而不是从实际行动中找到拯救。在这情形下,“二七惨案”对他可以说是个春雷,蛰伏在自我的小天地中的他,终于得探出头来看看他所生活的中国了。带着这新的视觉,胡风到了南京,他的思想和行为不能不发生显著的变化。

东南大学附中是个实行道尔顿制的新式中学,学生可以自由选课,胡风选修新文艺班,和巴金同期。在就读期间,他结识几个在人格上和思想上给他很大影响的朋友,其中他特别提到的是叫W君和Y君的两个人,他说他们使他“更多地知道了更关切地触到了社会”^②。根据胡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纪念革命中光荣牺牲的同志所写的长诗《安魂曲》,这两个人可能是宛希俨和杨天真。我们从这首长诗,可以看到胡风在南京时思想和心理的大概,以及

① 《民族战争与文艺性格》,页191~193,上海,希望社,1946。《文艺笔谈》,页402,上海,文学出版社,1937。又杨燕南书,杨燕南:《中共对胡风的斗争》,页78,香港,自由出版社,1956。又据《理想主义者时代底回忆》一文云,胡风把小说付邮后就离开武昌,小说发表时他已到了南京。这篇文章登于1923年3月29日和30日的《觉悟》,因此他是在这以前到南京的。

② 《民族战争与文艺性格》,页193,上海,希望社,1946。《文艺笔谈》,页403,上海,文学出版社,1937。

上述二人给他的影响。在纪念杨天真的一段诗里，他这样写：

一九二三年
对于我们青少年的一群
算得是一个回春的季节
我像一条醒来了的土蛹
感到了一股暖意
我醒开了眼
第一个看见的就是你
——你，一只正在试飞的蝴蝶

从这一节诗，可以看到 1923 年工人运动在胡风心目中的意义，也可以看出他遇到同好时的欣喜之情。诗中接着写他们一起生活的情景，那时杨天真每天上下课都带着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胡风经常与他

……一道到书店街去
找过了一家又找另一家
像是在冬天去找火种
抓在手里就感到一股暖气

这种激情的日子，在理论与理论间生发着社会和革命的意识，毕竟脱不了理想主义的色彩，因此在纪念宛希俨的诗节里，我们读到这样的句子：

多情的时代
但却是幼稚的时代
当毛泽东思想
还没有形成的时候
你离开了那个僵死的三段论法
却祇能跌进了热情没有生根的“唯物主义”

根据上面的叙述，在南京的这段时期，应该是胡风开始关心社会主义学说的时期。当他在武昌时，他虽然看共产党机关刊物《向导》和《武汉星期评论》，而且由恽代英等组织的“利群书社”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他可能接触了一些进步刊物，但那时他刚由小县城出来，对于社会主义学说，他可能只像对待胡适等主办的《努力周报》或其他读物似的一视同仁，当作一种新的思潮去接受而不

会注入特别的关心。此外,从他的《自传》和《理想主义者时代底回忆》等文来看,那时正在失母的哀痛中的他,占去他的心灵的是文艺作品而不是思想方面的论述。因此在武昌时,胡风似不可能对社会主义有什么了解,如果有,也可能不会超出爱罗先珂所传布的人道的、空想的安那其思想的范围,这在二十年代初的中国知识界是个相当普遍的现象,这一点我们下面会讨论到。可是等到胡风到南京时,情形就改观了,这时他遇到了杨天真、宛希俨等加入了共产党而且把生命献给革命的朋友,他会正式研读起马克思主义学说可以说是很自然的事,虽然他可能像宛希俨一样,在阅读时脱离了中国的社会现实,因而“祇能跌进了热情没有生根的‘唯物主义’”,像他后来在诗中所指出的。这其间的情形,我们可以由《安魂曲》得到一些消息,在纪念杨天真的诗节里,胡风回忆他们共同读《国家与革命》时的情形:

虽然我知道你不会读懂它
正和我没有能够读懂它一样的
但我还是觉得很高兴
看到你把它夹在手上
就彷彿隐隐地听见了一个声音:
“是的,我们的生活将成为另一个样子
我们的路上将要出现完全不同的东西……”^①

关于胡风在南京时可能读到些什么社会主义思想著作,在他没有具体说明的情形下,只有从当时出版界有关的译介来推测。到1925年胡风离开南京为止,一般说来,除了杂志和报刊上不计其数的介绍和论述^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主要著作被翻译成中文的并不多,不过他们一些较基础的、发生普遍影响的作品,有的已部分的或全部的被翻译出版,其中如《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家庭、私有制和国

① 以上所引诗节各见《安魂曲》,页12~15,48,华北,天下图书公司,1950。

② 据《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云:“‘五四’运动以后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变成一种最时髦的事情了。各种流派都有人介绍。如雨后春笋似的出版物,几乎或多或少地谈到了这个问题,有的三言两语,有的连篇累牍”。《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二册,页5~7,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家的起源》、《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劳农政府之成就与困难》等,这些都有单行本或在刊物上连载^①。除此之外,根据上面引的诗所说,胡风与杨天真在一起时,杨天真上下课都带着《国家与革命》一书的情形来看,他们那时候除了读中文翻译之外,是直接由外文读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因为这书直到1927年才有李春蕃(即柯柏年)的全译,而且是在汕头《岭东民国日报》副刊《革命》连载,它的单行本要到1929年才出现^②。从这一点来看,胡风在这阶段交往的朋友中,他们的阅读范围可能相当广泛,相当前卫,耳濡目染之余,这向往光明的“先天不足的理想主义者”,可能多少吸收了些他迫切需要的进步思想的营养了。

在社团活动方面,“五卅惨案”以前的南京,影响较大而且与社会主义运动有关的应属“少年中国学会”。这个组织1919年成立于北京,1924年总会迁到南京,直到1925年解散为止,它的会员和分会遍布全国,当时曾有“网罗天下人才”之称。早期的共产党员有不少加入其中,如李大钊是发起人之一,恽代英、邓中夏、黄日葵等则积极参加它的活动。学会的宗旨是反对政治斗争,提倡社会事业,企图通过发展科学、文化、教育和振兴实业来改造中国,对象是正在高等学校读书或从事文教工作的知识分子。由于它在思想方面提倡兼容并包,不赞成确定一种主义,因此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人,透过这个学会,在争取、团结和改造青年学生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绩。1924年它的总会迁到南京以前,南京的分会曾创办过《少年世界》月刊,又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联系,发行《少年社会》,提倡实际社会活动,主张教育救国。这两个刊物和学会本身的机关杂志《少年中国》月刊,对于当时南京的学生运动发生指导的作用。1923年,“少年中国学会”在南京和上海的会员开会决议“到青年中间去”,积极向学生灌输民族主义教育^③。胡风就在这个时候到了南京,他就读的那以“新精神”闻名全国的东南大学附中,想必与“少年中国学会”的活动有关,因为二十年代的中

① 关于马、恩、列著作中译情形,详见张静庐:《中国出版史料·补编》,页442~443,452~454,北京,中华书局,1957。

② 张静庐:《中国出版史料·补编》,页455,456,北京,中华书局,1957。

③ 《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一集,页235,237,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国,凡新的与进步的,几乎与社会主义脱不了关系。

从理论到实践,这是每个革命者的必经之路,像惊蛰之后“醒来了的土蛹”的胡风,终于在南京正式参加学生运动了。而后,当“五卅”的大浪在上海掀起,他觉得整个社会都跳动在他面前,他“沉进了人群底海里,忘掉了一切”,在那反军阀反资本主义的怒潮中,他成了南京市“奔走在街头和工厂里面的青年学生中间的一人”^①。比起两年多前他以一篇小说追悼“二七惨案”的死难者,在1925年的“五卅”运动中,他是个实际付诸行动的斗士。就在这个时候,他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中国解放斗争的革命先锋队的一员,那时他二十三岁^②。在这些行动后面,有整个动乱的社会现实在推动和支持他。

“二七惨案”后,全国的工人运动暂时陷入低潮,但在帝国主义操纵下的军阀混战却方兴未艾。从1923年到“五卅”以前,北方政坛先后发生了1923年10月曹锟贿选的闹剧,“猪仔国会”、“猪仔议员”的称呼,成了当时政治局势的一幅漫画。接着是第二次直奉战争,因冯玉祥倒戈,属于英、美势力的直系溃败,1924年底,北京成立了奉、皖两系军阀扶持的段祺瑞临时执政政府,在日本人的羽翼下垄断了北方政权。同一个时候,南方发生广东商团叛变,逼迫孙中山下野,企图推翻广东革命政府,并杀害大批示威游行的群众。在这天下大乱的局势中,孙中山改组了国民党,接纳共产党的意见,宣布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为斗争目标,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为政策,形成第一次民主革命统一战线。国共合作推动了群众革命运动,农民运动方面以湖南、广东为中心迅速地发展起来,工人方面则由1924年7月广州沙面工人反抗英国人的剥削而引起的罢工,把工人运动带到复兴时期。这新的情势发展到1925年,终于由反抗日本纱厂残酷压榨中国工人的大罢工为导火线,引发了震撼全国的五卅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的革命高潮。这运动迅速扩展到全国各地,工人、学生、市民纷纷举行罢工、罢课、罢市和

① 《文艺笔谈》,页403,上海,文学出版社,1937。

② 见《文艺报》第11期(1955),页4;鲁喟然:《胡风事件的前因后果》,页2,香港,南风出版社,1956。赵聪:《胡风爆炸的火花》,见《大陆文坛风景画》,页80,香港,友联出版社,1958。

示威游行，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从1925年6月起至1926年10月为止，坚持了将近一年半的广州与香港工人联合的省港大罢工，以及1925年6月为抗议“五卅惨案”和援助香港工人，被英、法、葡军队杀伤两百余人的广州“沙基惨案”^①。从社会主义的革命理论里，当胡风和他的朋友们抬起头来，他们看到的是如上的悲惨现实，武汉“二七惨案”曾引起他那属于“当时青年人所有的愤激”，这一次，当然更不能例外。

混乱的社会现实加上新的思想的影响，暂时把胡风从忧郁的深渊解放出来，这情形生动地表现在他在南京时所写的诗里，其中，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一种期许的心理。在他1925写的《儿时的湖山》这首诗里，我们读到当他重访那使他觉得“惨然”的故乡的湖山之后，对自己、对未来下了这样的一道挑战的誓词：

解放你底灵魂啊，
要一个赤裸裸的你，
唤醒你底国魂啊，
要一个热烘烘的你，
打倒这世界上庞大的木头神啊，
要一个雄赳赳的你。
你有四海为家的浪子啊，
归来何为！^②

紧接在这期许的心理之后，是热切的追求。在他同时期写的《赠S》里，胡风先劝告他在武昌时认识的朋友：“莫看天上的云/为苍狗/为河岳/它是太容易变了/稚弱的你/经不起诱惑呀”。接着他唱：

朋友啊，
也不要太信任了那渡头的舟子，
河水东西流，
浮云上下游，

① 以上史实详见胡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第三、四章，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梁寒冰编著：《中国现代革命史教学参考提纲》，《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一章，页50~60，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56。

② 《野花与箭》，页4~5，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6。

他盲目的生涯，

怎能指示你前途的风波呀？

浮云流水，加上渡头的古舟子，正是文学少年们行吟不已的场所，在这里，胡风是决心与之告别了。为了服从时代的命令，他们必须前进，必须在跋涉中以荆棘刺出的血来破除“长途的静寂”，在死亡中“领略到牺牲的意味”。带着这决心，胡风从《春水》、《湖畔》的世界走出来，展开在他面前的道路是：

天涯海角，

有颗明星，

朋友啊，

捧着颤动的心，

沸腾的血，

严霜之夜冷月下，

我们寻去吧！^①

在上述的期许和追求的心理下，被远大的未来吸引，胡风结束他在南京奔走于工厂和学生运动的日子，1925年暑假，他考进“五四”以来被全国青年看成文化圣地的北京大学。从湖北蕲春乡下到北京，不到十年的时间，他走过了大半个中国，他所要求的跟鲁迅及其追随者并没有两样，那便是冲开黑暗的闸门，到光明的地方去，可是当他终于到达了心目中的光源所在的北京，他得到的是更大的失望和失落。在进行讨论这问题前，我们必须先看看胡风在南京时思想发展的另一情形。

三

由于在东南大学附中念的是新文艺班，因此胡风除了被时代的浪潮推动，热切地寻求革命思想的火种之外，他那被“五四”文化唤醒了的自我意识，同时采取另一个姿态在成长着，那便是文学为他打开的内心世界。他后来在回忆南京生活的文章里说，那时他除了更多和更关切地接触到社会问题之外，他“对于文学的气息也更加敏感更加迷恋了”。又说：

这时候我读了两本没头没脑地把我淹没了的书：托尔斯

^①《野花与箭》，页7~8,10，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6。

泰底《复活》和厨川白村底《苦闷的象征》。恋爱和艺术，似乎是表现人生里面的什么至上的东西的两面，和我的社会行为渐渐地矛盾起来了。^①

这是胡风第一次“明确地”感觉到存在于他生活中的矛盾。从他这段话所说的“至上的”东西，还有前面讨论过的他在这阶段中的思想发展，我们知道他遭遇到的应该是进步的世界观和知识贵族的心灵生活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它之所以发生，正如胡风之接近社会主义思想一样，可以说是被他的时代以及被“五四”文化的内容所决定的不可避免的结果。

前面曾提到，当胡风在武昌开始接触新文学作品时，引起他兴趣的并不是鸳鸯蝴蝶的爱情故事，而是属于新时代气息的东西。此外，在选择上我们还发现他比较倾向于理想和梦幻的一面，而非青春的激情与狂想。从表面上看，这在当时以“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为代表的两大文学潮流中，是属于“为人生”的文学研究会的一边，而非创造社所标榜的“狂风暴雨”式的浪漫，因此他从文学方面所受的影响似乎应与真实人生靠近，而不致陷入反抗和破坏的激情，或在颓废的深渊中沉沦，像创造社诸人一样。可是我们若历史地、社会地考察这一问题，当不难发现不论是以改造人生为出发点的文学研究会，或高唱自由浪漫的创造社，它们的作品，都是对1920年代初混乱的中国现状的一种情绪上的和意识上的反拨，因此可以说它们都是当时的社会现实和文化的批判者，它们间的不同只在表现的方式，那便是王瑶所说的：“文学研究会的作家们想从现实人生的认识里寻求改革，创造社的作家们想用他们的热情来叫出改革的愿望”^②。此外，就组成分子来看，两者都是辛亥革命后知识阶层第一次分裂后的欧化派人物，他们除了在反国故、反封建的立场一致外，在思想根源上可以说都逃不出资本主义思想的范围，在文学的营养上，他们吸取到的大致是他们觉得迫切需要的而事实上未必能拯救他们的精神的偏方。关于这整个情形，鲁迅说：

那时觉醒起来的知识青年的心情，是大抵热烈，然而悲凉

^① 《文艺笔谈》，页403，上海，文学出版社，1937。

^②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页53，香港，波文书局影印，1972。

的,即使寻到一点光明,“径一周三”,却是分明的看见了周围的无涯际的黑暗。摄取来的异域营养又是“世纪末”的果汁:王尔德(Oscar Wilde),尼采(Fr. Nietzsche),波特莱尔(Ch. Baudelaire),安特莱夫(L. Andrev)们所安排的。^①

这是以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为首的文艺从事者的一般处境,也是他们的心灵生活的场所。在这条件下,胡风从他起始接触到的中国作家的世界很快抵达厨川白村和托尔斯泰的“异域”,是很自然的一件事,他会被后者的人道主义和前者那融柏格森和佛洛依德思想于一炉的艺术理论,“没头没脑”地淹没,也是无法避免的,因为这只不过是到达他的前行者的“五四”作家们所来自的创作力量的源头,只不过找到了一个共同的文艺上的万神庙的所在而已。就在这万神庙里,胡风接受了“世纪末”的文艺醴泉的洗礼,在异邦诸神的护卫下找到了心灵的归止,但最后终于发现这一切和他的社会行为相抵触,这个问题一直纠缠他到日本留学后才解决。为了较具体地了解其中的症结所在,我们必须对当时的文学团体的各种主张,还有当时文艺思想的一般动向作一简单的考察。

1921年1月,文学研究会在北京成立,《宣言》中说:

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治文学的人也当以这事为他终身的事业,正如劳农一样。^②

这是文学研究会的基本态度,也是它对文艺创作的基本观念。在这些信念下,文学研究会除了提倡“反映社会的现象,表现并且讨论一些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的创作^③,还注重西洋文学批评和翻译,他们接办当时已发行了十几年的《小说月报》,加以革新和扩充,使它成为新文学运动后的第一个纯文学杂志。在《改革宣言》

① 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第四册《小说二集,导言》,页5~6,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6。

② 《文学研究会宣言》,《中国新文学大系》第十册,页75~76,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6。

③ 《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三册《小说一集,导言》,页4,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6。

中说：“将于译述西洋名家小说而外，兼介绍世界文学潮流之趋向，讨论中国文学革进之方法”^①。在相同的意念下，他们又发行以翻译介绍为主的《文学研究会丛书》，企图根本铲除以消遣主义的眼光来看文学，在丛书发行缘起里，他们进一步提出对文学的看法云：

我们觉得文学是绝不容轻视的。他的伟大与影响，是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与之相并的。他是人生的镜子，能够以慈祥和蔼的光明，把人们的一切阶级，一切国种界，一切人我界，都融合在里面，用深沉的人道的心灵，轻轻的把一切隔阂扫除掉。唯有他，能够立在混乱屠杀的现世界中，呼唤出人类一体的福音，使得压迫人的阶级，也能深深的同情被压迫的阶级。他是人们的最高精神与情绪的流通的介绍者。被许多层次的隔板所间断的人们，由他的介绍，始能恢复这个最高精神与情绪的流通。^②

这里所谓“人道的心灵”，“人类一体的福音”，“最高精神与情绪的流通”等，可以看出文学研究会诸人除了相信文学的特殊的社会功能外，还把它看作是超越的、站在人类意识生产的最高处的东西，它可以说是人类心灵的世界语。根据这些观念，他们翻译了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西洋文学作品，希望通过它们来“创造中国的新文学，以谋我们与人类全体的最高精神与情绪的流通”，在宗旨上是：

夫将欲取远大之规模尽贡献之责任，则预备研究，愈久愈博愈广，结果愈佳，即不论如何相反之主义或有研究之必要。故对于为艺术的艺术与为人生的艺术，两无所袒。^③

由于文学研究会是“五四”运动后第一个新文艺团体，也是维持较久影响较大的一个，它的主张和态度，对新文学的从事者和新的文学观的确立不能不发生一定的作用，它在翻译和介绍上不偏

①《小说月报改革宣言》，《中国新文学大系》第十册，页80，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6。

②《文学研究会丛书缘起》，《中国新文学大系》第十册，页77，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6。

③《小说月报改革宣言》，《中国新文学大系》第十册，页81，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6。

袒任何主义和思想的宗旨,也为新文学的万神庙立下一个大概的规模。虽然在创作上他们鼓吹写实主义,但在与“时代的呼号相应答”的前提下^①,他们为新文学开辟出来的仍是块集当代文艺流派于一体的百花齐放的园地。上面鲁迅说的世纪末果汁之一的安特莱夫,就是首先经他们翻译进来的,而被茅盾认为带有社会批判意味的文学研究会的“问题小说”,像冰心的《超人》,则是尼采哲学的死硬的翻版,到了孙俚工 1925 年发表的《海的渴慕者》,它的主角便纯然以“‘安那其思想’的说教者的姿态出现了”^②。

当文学研究会的作家在五卅运动以前的中国,急于在作品里为人生的意义定位,创造社诸人则更进一步想在文学中升华他们的“内心的要求”。这个自称“没有划一的主义”的文学团体,它的成员与文学研究会一样,都是“在社会的桎梏之下呻吟着的‘时代儿’”^③,不同的是,他们是直接被资本主义社会陶养出来的青年,都在日本留学时深受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因此在意识上就带着更大的世纪末的色彩,对文艺的观点也更带着脱离现实之后的绝对化的倾向。关于前一点郑伯奇曾说,创造社诸人因为在国外住得长久,当时外国流行的思想自然会影响到他们,“哲学上,理知主义的破产;文学上,自然主义的失败”,终于“使他们走上了反理知主义的浪漫主义的道路上”^④。他这里把浪漫和反理知相同对待,正道出了创造社作品的热情憧憬和苦闷颓废的双重性质的根源,而这是资本主义思想发展到二十世纪前后的一般趋向。至于文学观点的绝对化,则普遍表现在创造社的早期理论文字中,他们虽在《艺术之社会的意义》、《文艺之社会的使命》一类的论文里,高谈文艺的社会功能和时代使命,但归结起来那观点不外是“精神上

① 郑振铎:《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导言》云:文学研究会“提倡血与泪的文学,主张人们必须和时代的呼号相应答,必须敏感着苦难的社会而为之写作”。见《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二册,页 9 引,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6。

② 《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三册《小说一集,导言》,页 20,21,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6。

③ 郑伯奇:《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五册《小说三集,导言》,页 8~9,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6。

④ 郑伯奇:《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五册《小说二集,导言》,页 12,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6。